

Why China?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923-1950

为什么去中国

——1923-1950 年在中国的回忆

[澳] C·P·菲茨杰拉德(CP FitzGerald) 著

郇忠李尧译



本书根据1985年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 Why China?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923-1950 翻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Why China?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923-1950

为什么去中国

——1923-1950 年在中国的回忆

[澳] C·P·菲茨杰拉尔德 (CP FitzGerald) 著

郇 忠 李 尧 译



本书根据 1985 年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 Why China?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923-1950 翻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为什么去中国: 1923~1950 年在中国的回忆/ (澳)
菲茨杰拉尔德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7
ISBN 7-80603-967-8

I. 为... II. 菲...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1923
~1950 IV. K2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017 号

Copyright: 2004 Anthea and Mirabel FitzGeral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Anthea and Mirabel FitzGeral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is copyright. Apart from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s of private study, research,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proces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nquiries should be made to the publisher.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25 印张 68 幅图 1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本书由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和澳大利亚
外交外贸部资助出版

This Edi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Australia-China
Council and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米拉贝尔·菲茨杰拉尔德	/1
序言		/ 4
第一章	为什么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2-1923 年)	/ 7
第二章	六十年前的中国	/ 20
第三章	“学汉语的人都是疯子”	/ 36
第四章	“骡子比人值钱”	/ 54
第五章	是真革命吗	/ 70
第六章	湖北佬	/ 88
第七章	战争中的军阀们	/103
第八章	“好十年，坏万年”	/117
第九章	“好人不夜行”	/ 136
第十章	被遗忘的北京 (1931-1932 年)	/154
第十一章	云彩的南边	/ 170
第十二章	虎跳涧	/ 195
第十三章	真正的革命	/ 221
第十四章	围困北京	/238

中文版序言

查尔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尔德 1902 年生于英格兰。1917 年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激起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学习汉语之后，1923 年，菲茨杰拉尔德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此后三十年，他几乎都生活在中国，将自己对中国的迷恋变成了现实。

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用文字、照片记录了许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背景。尽管他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专著，但是直到晚年，他才接受人们的劝告，记录了那段难忘的时光、期间发生的事情和他熟悉的地方。可以说，《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 年在中国的回忆》是查尔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尔德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的自传。菲茨杰拉尔德花了许多时间旅游。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在英国外事办公室工作，1946 年到 1950 年在驻中国的英国顾问团工作。1951 年，他被聘请为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研究系高级讲师。1954 年，成为东方历史教授。1968 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并且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从 1970 年到 1972 年，菲茨杰拉尔德教授是墨尔本大学现代中文系客座教授。他还是澳大利亚人文学院的创始人。是二十一本书和难以计数的文章的作者。

C·P·菲茨杰拉尔德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有相当的研究。在澳大利亚，他之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献身于研究中国的事业，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中国长期生活，积累了那么多经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理解中国当代的政治。因此，他是以历史学

家深邃的目光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去观察中国、并且把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他以促进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为己任，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的妹妹安西娅和我——他的两个女儿——很早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让C·P·菲茨杰拉尔德的著作和他拍摄的照片，作为历史的记录，在中国出版。1999年，我们姐妹俩一起到中国旅游。这次中国之行，不断勾起许多往事的回忆，还得到许多知道菲茨杰拉尔德著作的中国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于是，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介绍给当代中国读者的念头更强烈了。

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我们找出父亲三十多年间拍摄的许多照片和底片，立刻意识到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的价值。原先保留下来的底片第一次洗印，大部分效果相当不错。洗印出来的这些照片详细记录了菲茨杰拉尔德在中国度过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特别是从1936年到1938年，他在云南度过的那两年。这些照片将在《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一书出版后展览。展览将在与它们的来源有关的省份和城市巡回举办。比如北京，云南，贵州，还有澳大利亚。

这本书给当代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外国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对中国的感受、理解和思考。杰出的澳大利亚作家、对中澳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尼古拉斯·周思，对本书做了如下的评价：

C·P·菲茨杰拉尔德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无人超过。他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回忆录《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写于垂暮之年。这本书详细叙述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展示在读者面前。对中国历史学界，这本书无疑也是重要贡献，理应让更多的中国人对其了解。同时，这本书也是一个对旧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的学者的心声。他的作品价值，应当在当代中国得到新的评价。《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的中文译本将受到

中国读者广泛的欢迎，并且在澳中两国历史学家的交流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1985年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中文译本就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的。其中收入了更多照片，比原著更详细地展示了菲茨杰拉尔德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代博拉·柯比-帕森斯为重印这些照片和菲茨杰拉尔德的其他文献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这本书的出版使我的梦想变成现实。这个“演变”过程有两个重要环节。第一个环节是，2000年，我在北京经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介绍，认识了李尧教授——中国颇富经验的澳大利亚著作翻译者。我非常感谢他和山东画报出版社洽谈有关出版此书的种种细节，以及我们之间愉快的合作，包括边吃北京烤鸭，边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

我还要感谢澳中理事会的支持。他们资助了此书的翻译和出版。这自然是该书与中国广大读者得以见面的第二个重要环节。

米拉贝尔·菲茨杰拉尔德

2004年1月 悉尼，澳大利亚

序 言

本书是为了回答书名中提出并经常被人们问及的那个问题而写的。它既不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代史，更不是一部完整的自传。前者，一批人数日渐增多、学有专长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探索、著书立说；而后者，恐怕读来令人生厌。书中筛选出来的回忆片断，有的为了说明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可能并不十分重要，有的则被寄予这样的期望：它们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看法，以及一些已然被忘却的历史事件。这些往事可能读来兴味盎然，甚至对社会史学家们也有所裨益。书中对作者在英王爱德华时代度过的童年作了纪实性的描述。严格、刻板的校纪虽然现在不被推崇，但从爱德华国王到乔治国王时代，男子学校的特点依然尽人皆知。孩提时代那些杂乱无序的回忆记述了一个孩子的所见所闻。这些见闻对其后来的成长可能有重要的影响。不管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它们都会培养起一个人青春时期的志向，而且我相信，往往会决定他的一生。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逆反心理，习惯于把任何一种肯定的说法、命题或者评价颠倒过来考虑，以为这样做也许更明智一些。比如，“畏惧上帝，膜拜国王”。这句话在皇权显赫的时代，不妨把它说成“膜拜上帝，畏惧国王”。因为任何人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膜拜上帝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可是，倘若你惹怒国王，他肯定会砍下你的脑袋。我之所以能领悟这个道理，也许应该归功于——或者感谢——我那位预科学校校长自鸣得意的基督教信仰。在学校附属教堂的礼拜仪式上，他把虔诚的宗教信仰与其可怕的严酷外表结合在一起，使年仅十

一岁的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说教。不仅如此，我还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阅读的途径去探索，力图掌握更多与他的说教相反的知识。探索，使我从来不肯轻信任何司空见惯的东西。

也许，正是这种早年形成的观点，才是我被中国以及中国人深深吸引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没有不容抗争的上帝的文明。没有正式的、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宗教的文明。是三种选择。这三种选择勉强可以说成是“通往同一目标的三条道路”。目标是一种渴望，而不是获得。也许，这个目标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我而言，对于目标的渴望似乎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方法，值得认真审视。我仍满怀渴望，向那目标前进。

第一章

为什么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2-1923 年)

我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有南非的亲属。外祖父菲茨帕特里克是殖民地部的一名法官，晚年在开普敦供职。在早期的宦生涯中，他一直是爱尔兰自治运动领导人巴涅尔的秘书。后来，到殖民地部任职时，被委派到那时的殖民地黄金海岸，即现代的加纳。那时，加纳被称为“臭名昭著的贝宁海岸”。出入那里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我的外祖父虽然从黄热病中死里逃生，但疾病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外祖父有三个女儿、四个儿子。我母亲年龄最大。她出生在爱尔兰，但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开普敦长大。外祖父的长子培尔西（后来称培尔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布尔战争^①前后，在南非政坛十分活跃，著有《南非灌木丛中的爱尔兰乡下小伙子》一书。该书讲述他早年在西非旅游时的见闻，此外，他还写过几本有关政治的书。外祖父的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死于1896年马塔贝利人^②的叛乱和布尔战争。

我父亲一方的家史，因为是用传统口述的方式留传下来的，所以颇富传奇色彩。大约在18世纪末叶，当法国的革命军侵占奥地利的尼法兰（比利时）的时候，我的曾祖父与弟弟马里奥一起来到南非。他身穿齐膝的短

① 布尔战争 (Boer War): 指 1899 年至 1902 年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战争。

② 马塔贝利人 (Matabele): 居住在非洲津巴布韦的祖鲁人。

裤和丝质长统袜，脚踏饰有银质扣形饰物的皮鞋。有人说他穿扮得像个18世纪的绅士。他在开普殖民地北部靠近奥兰吉河的地方获得一片土地。也许在那时之前，或者正在那个时候，英国刚刚占领了那个地区。他对任何人都说不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让人叫他桑依尔。桑依尔是流经他故乡的一条河流的名字。那条河不大，部分流经现在的比利时，部分流经卢森堡。那时，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如通常所说，奥地利的尼法兰。曾祖父会讲法语、荷兰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不讲英语，甚至在刚到那里的时候也不讲。

曾祖父到达南非以后的某个时期，也许在1805年左右，与一位姓理查德的法国小姐结了婚。她出身于一个胡格诺教徒^①家庭。理查德一家可能也是逃避欧洲革命的流亡者，因为我的曾外祖母讲的是法语。几年过去了，滑铁卢战役以后，曾经有两位绅士从欧洲来南非找我的曾祖父。他们在曾祖父的农场里呆了两天，试图劝说曾祖父返回祖国。这件事是我那位年迈的姑妈——我父亲的第二个妹妹，1929年告诉她的妹妹M·弗兰彻·穆兰的。我姑妈说，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和我的曾祖母一起住在开普殖民地东北部曾祖母的农场里。她的祖母告诉了她这件事。那一定是1850年左右。那时，我的曾祖母可能已经七十出头了。

她说，那两天，两位客人与我曾祖父整天在农场屋前的游廊里走来走去，争论得很激烈。可是曾祖母听不懂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说的既不是荷兰语，也不是法语。最后，曾祖父向全家宣布：

那两位绅士历经千难万险，不远万里前来找我，劝我返回祖国。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为我的利益而进行的努力深表谢意，但我拿定主意，坚决不回法国。此外，我将永远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在这里的朋友们也已表示，他们也不会说出我的真实姓名。我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就这样，他们在那里扎下根来，下一代被进一步同化。在父亲著的《过去的非洲》（伦敦，1937年）一书中，只字不提他的家世，对他的家庭也同样含糊其词。书中谈到，祖父是一个基督教徒，一度曾在奥兰吉自

① 胡格诺教徒：指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多数属于加尔文宗。

治州做官，后来好像又搬迁到奥兰吉河旁的开普殖民地。祖父的宗教信仰十分坚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姑妈或者叔父都不曾虔诚地信仰过任何一个教派。我的父亲更没有。我母亲是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成长起来的，而我父亲却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加尔文主义信徒。开普敦成见很深的神父拒绝我父母亲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他说，他俩的婚礼只能在教堂外侧的走廊里举行。我母亲回答说：“倘若我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我将不再踏进教堂一步。”她未能走进教堂。他俩举行了一个没有宗教仪式的婚礼。因此，他们所有孩子都只受到一种自然神论者的宗教教育。我的两位姑妈在晚年时又回到罗马教堂，其他人都变成了不可知论者。

19世纪70年代初期，我父亲离家去苏格兰的爱丁堡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在那期间以及返回南非之后，他在南非中部城市金伯利的钻石矿当了几年卫生官员。后来，又到约翰内斯堡，在曾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塞西尔·罗兹手下工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从事过医学工作。他曾经远征到马塔贝利人聚居的津罗本格拉（现在的津巴布韦），与另外一位随员一道，陪同罗兹去迈托普山脉，与马塔贝利人的首领会晤，并且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在他著的那本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大约在布尔战争期间——也许是1901年——父亲到伦敦为罗兹管理财务。我认为，这次永久性的移居也许和我父亲在布尔战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英国一边有关。而他的几个兄弟和其他亲属都站在布尔人一边。

我出生在威斯特布恩大街二号的一幢房子里。我上的幼儿园在切尔沃斯大街，而我新近的住址在格卢西斯特大街。这条街正好在上面说的那两条大街中间。这也许让人想到某种连续性，而事实上，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存在这种连续性，更不存在地域上的天意安排。所幸，只有那些早期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物保持了它们七十多年前的建筑风格。所有那时的私人住宅，现在有的变成饭店，有的夷为平地，就连那所幼儿园也改造成一家地毯公司的办公楼。不过，那些街道的外观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我父亲在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有房地产。记得，我因为听说我们全家都要去那儿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据说那里的房子周围都是六英尺多高的荒草。我还知

道那里有凶猛的野兽。狮子、豹子和其它猛兽成群结队地出没在离布拉约市不远的地区。于是，我预见到一种索然无味而又担惊受怕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些身处险境的人在狮子从藏身之地跳出来之前，可能会发疯似地冲进隔壁的大门。

实际情况与我的想象有相当大的距离，但那些想象中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仍然那么清晰。对我们四个孩子来说，罗得西亚农场的生活绝对谈不上单调乏味。偶然还有几个惊险场面。庭院里有许许多多美丽的蝴蝶。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和我对它们着了迷。我渴望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一天，在自由飞翔的理想蛊惑下，我爬到停在马厩围栏里一辆高大的拉货四轮马车的车轮上。车轮足有五英尺高，设计得足以越过非洲南部丛林地带的任何障碍。我摆好姿势，伸开双臂，口中念念有词：“好，潘蒂要飞了！”身子猛然前倾，向坚硬的地面纵身跳去。结果可想而知——重重的撞击碰坏了我的脸、膝盖和手臂，也摧毁了我那自由飞翔的信念。

第二年，1906年，我们举家回到英国，并且在格洛斯特广场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定居下来。新居与以前的房子依然在同一个街区。那时，我们常去海德公园或者金森顿花园散步。在维多利亚门附近，从兰开斯特门吐博汽车站向上的一道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置于低速档的公共汽车嘎吱嘎吱地响着，缓慢地驶向坡顶。这是未来的象征。这种征兆给人的感觉，与相对久远的过去给人的那种迷人而模糊的感觉十分相似。每当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就动身去公园散步。穿过苏塞克斯广场的时候，从广场的一幢住宅旁总会驶出一辆敞篷马车。车上坐着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她的衣服可能是五十多年前流行的款式。在驭者座上，坐着马车夫和一个男仆，他们都身穿号衣：帽顶有花结的黑礼帽，红外套，白裤子，长筒黑皮靴。老太太身后坐着一名身穿同样号衣的小听差。拉车的是两匹非常漂亮的灰色高头大马。更令我们兴奋不已的是，马车的后车轴下面，跑着两条没有锁链、步态优雅的达尔马提亚狗。它们从不偏离指定的位置。进入公园之后，老太太和她的护送者们乘马车兜一圈风，便回到住宅。

我对国际事件的第一个记忆也发生在1906年。这个事件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对马岛海战。保姆给我和哥哥读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是关

于俄罗斯旗舰最后沉没时悲壮而浪漫的一幕：“当旗舰倾侧、进而沉没的时候，舰队司令依然站在舰桥上立正敬礼”。舰桥？我不明白什么是舰桥。我知道桥是什么样子。金森顿公园就有一座桥。那座桥横跨在弯弯曲曲的河上，我们不仅亲眼见过，而且几乎每天都跨过它。可是，在一条船上，难道能有类似于桥的东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无疑这才是我牢牢记得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对马岛海战意味着什么。

马布尔拱门本身既是一道景观，又是公园的入口。公园的正门留给王族成员出入，通常大门紧闭。普通的马车就从东门入，西门出。星期天下午，作为一种“款待”，我们常常坐着父母亲的马车去逛公园。可这种“款待”并不总是令人高兴。首先，有几百辆马车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都是要通过马布尔拱门进入公园。拱门很窄，一次只能通过一辆马车。因此，不计其数的马车排成的长队便一直延伸到伯斯维特大街。我们像蜗牛爬行一样，在马车的长龙中行进。等啊，等啊，好像一直要等好几个小时。车前车后，马都在流汗、排粪。炎热的夏天，那种刺鼻的臭味令人终生难忘。现在，伦敦街道上的汽油味固然令人不快，但是，抱怨汽车的人实在应该想想往日的那些马。

1910年12月，我，哥哥和两个姐姐在公园里散步。两个姐姐分别是十六岁和十四岁。我八岁，哥哥十一岁。哥哥不厌其烦地唱着当时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两句：“1910年，德国人将进攻我们。”我们再三恳求也中止不了他引吭高歌。我实在忍受不了，尖声喊叫起来：“照你这个唱法，再有三天德国人就要打来了！”我的话受到大姐的赞赏。那以前，她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说出什么值得一听的话来。我也为自己的“妙语”非常得意。我的“妙语”另外一个效果是终止了哥哥那无休无止的歌唱。现在，人们已经不大知道，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德国人打仗的预测就已经沸沸扬扬，甚至在儿童中间漫延开来。我的父母对战争也一定怀着同样的恐惧。大约第二年，父母亲带我们去看戏，剧名是《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剧名便隐含了德国人入侵及其灾难性结局的主题。该剧描写一位英国乡下绅士，起初忽视了德国人入侵的危险，后来就用他的房屋作堡垒，抗击入侵的敌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戏剧。